

写作与文风

叶 星



写作与文风

叶 星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太原

写作与文风

叶 星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frac{1}{8}$ 字数: 128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9,700册

书号: 7088·695 定价: 2.40元

写在前面

文风，有人讲，是文章风格，是语言表达和文字技巧问题。这些都不错。但它的实际含义更广泛得多。文风，不单是语言文字问题，更重要的是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问题。它往往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作风和气魄。

作为报纸的编辑，每天要看几十篇以至上百篇的稿件；由于工作需要，平时也阅读一些古今中外的作品。总有这么一个感觉：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文风败坏了，败坏得不成样子。每读到那些帮八股气十足的讲话和文章，心头就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愤慨；每读到那些受帮八股影响的作品和文章，就读不下去，感觉头疼，感到不安；而每当读到那些清算了帮八股，树立了新文风的优秀作品和稿件，就耳目一新，爱不释手，禁不住拍案叫绝！怎样把林彪、“四人帮”搞乱的东西加以廓清，使准确、鲜明、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得到恢复和发扬。怎样肃清林彪、

“四人帮”的流毒，改掉自己文风上的毛病？这是笔者经常思考、经常与人谈论的问题。读一篇文章，朗诵一首诗词，听一段相声，看一场电影、一出戏、一幅漫画，都常常和文风上的是和非联系起来。每思有所得，议有所获，随手做些摘录、剪贴，写点随感式的笔记。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这么一些东西。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文风。我们国家已经

进入了以搞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内容的新的发展时期。新时期需要新文风。出于这种愿望，我们才不揣浅陋，把过去积累的东西整理出来，这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种学习；如果在读者当中，特别是在文字工作者、语文教学工作者和初学写作的青年同志当中，能引起对改进文风的重视并稍许有所启示和补益的话，那将是我们感到欣慰的。

作 者

一九八〇年五月于北京

目 录

“请看事实”八题·····	(1)
废话今昔·····	(10)
不要因人废言·····	(16)
文贵实事求是	
——《连队建设要搞好，实事求是很重要	
——调查事例选议》评介·····	(21)
文似看山不喜平·····	(28)
摒绝浮华·····	(34)
莫将文章当古董·····	(39)
短些，短些，再短些！·····	(44)
仙鹤与野鸭·····	(47)
漫话“对牛弹琴”·····	(51)
关于“抄”·····	(56)
文风一忌——东施效颦·····	(62)
明太祖的苦恼在今天·····	(67)
读《论“他妈的”！》·····	(72)
字风不正种种·····	(76)
“愿有爱憎之念到这样”·····	(80)
“击在绷得最紧的弦上”·····	(84)
文章得失不由天·····	(89)
脚板底下出文章·····	(96)

为有源头活水来·····	(101)
文成于思·····	(107)
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	(113)
语不惊人死不休·····	(119)
要用自己的写话文章·····	(126)
关于词多词少的问答·····	(132)
信赖大白话·····	(138)
不要干“驴唇不对马嘴”的事情·····	(143)
丑媳妇先要见公婆·····	(146)
胆识篇·····	(151)
把心捧给读者	
——我爱英瑞编后感·····	(155)
“一字师”赞·····	(160)
修改文章卡片选·····	(164)
有感于一个假设的故事·····	(173)
“风格即人”断想·····	(178)
善用典的典范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和谈话一得·····	(183)

“请看事实”八题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的这段很出名的话，充分地反映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表现了无产阶级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显示了共产党人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战斗风格。“请看事实”，这不但是我们揭露敌人的谣言和诡辩，宣传自己的成就和胜利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是进行一切形式的写作所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如果有人问什么样的文风坏，什么样的文风好，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空话连篇，坏；让事实说话，好。

最有说服力的是事实

现代化的大农业到底是什么样子，农业机械化究竟有什么好处？一九七八年《中国青年》杂志第四期《来自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的报告》这样写道：

“二十个人使用这套农业机械，耕种了近两万亩土地，

在三江平原多年未见的严重干旱情况下，收获了四百多万斤粮食，平均每人生产二十余万斤，产值不比一个普通工人低。目前我国农村每个劳动力平均种四五亩地，生产一千八百斤粮食，按每人六百斤计算，一人养活三个人（包括自己）。而二队每人种地近一千亩，生产的粮食，一人可以养活三百三十个人。耕地面积提高二百倍，生产粮食和养活的人口提高了一百多倍。创造了我国农业史上最高的劳动生产率。”

这完全是实际事实之叙述。事实是客观的、权威的，是有说服力的。寥寥数语，胜过空话千言。作者将事实用对比方法这么一摆，要阐述的观点全出来了。这里无须再画蛇添足地去形容现代化的美妙，也不必再重申：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读者看了事实，自然就可以去下判断、作结论了。从这里可以见出：一个高明的作者，一个厉害的宣传家，总是把事实推向前台，善于用事实说话，而自己则常常是隐身幕后，不轻易插嘴的。

事实胜于雄辩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得到过这么多诗篇，
历史上没有一个人，
得到过这么多花圈！

这是诗人艾青写的一首悼念周总理的诗。有人对这样的四句话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样的话只能用来歌颂毛主席。对于这种指摘，艾青是怎么回答的呢？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我写的是总理逝世的时候，写的是丙辰清明前后，写

的是天安门事件。那时候毛主席还健在。”“那时候，毛主席还健在”，这九个字，是事实，是胜于任何雄辩的事实。在这里，没有怒形于色，没有慷慨陈词，有的只是铁一般的事实。在这九个字面前，最善于辞令的人，也将无言以对；最惯于给别人扣帽子的人，也不得不把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最喜欢告状的人，也只好垂手立于被告席上。

没有事实等于什么也没有

人们大概不会忘记，前些年曾经出现过一篇谬种流传、害人不浅的文章，叫做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七字经”，称得起是林彪、“四人帮”空话文风的代表作。这里不妨举出几段看看：

“天天读雷打不散，学习班层层举办，讲用会坚持不断，谈心活动普遍开展。从工厂到宿舍，到处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课堂，从工人到家属，人人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使全厂发生了‘红太阳光辉照满厂，人换思想厂换装’的深刻变化。”

“‘七字经’最本质的东西，在于突出了一个‘用’字，贯穿了一个‘斗’字，强调了一个‘查’字。”

“‘七字经’是个宝，问题带得准，精神记得牢，用得活，提得高，立竿见影，方法实在好。”……

这篇洋洋七千言的调查报告，哪里是“实际事实之叙述”？根本就举不出一个象样的事实。人们从这些空空洞洞的词藻里，既看不到工人的丰富实践，也听不到真正来自群众的声音。大量堆砌起来的概念，无非是从林彪的所谓“三十字方针”里演化而来的。

先有材料，后有观点，先有事实后有结论，这是唯物主义的常识。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在宣传报道上大搞唯心论、形而上学，根本违背了用事实讲话的原则。在他们看来，事实是无足轻重的，有了观点就有了一切。而实际上，没有事实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在他们炮制的此类文章中（还有什么“影射史学”，“阴谋文艺”等等），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的话，那有的只能是“倒过来”的哲学，吓人的战术，毒辣的诡计，腐朽的文风！

摆事实，讲道理

常常听到一种说法：理论文章和新闻报道不同，不一定强调用事实说话。理论主要是说理，这是对的。但是，理论的根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实践，理论的阐述也就离不开事实。你要把理说透，把文章写得血肉丰满，骨格健全，不用事实说话是难以做到的。

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况在《劝学》中，为证明学习必须专心致志才能收到显著效果的道理，这样写道：“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蟾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这里列举的千里马和劣马，雕刻朽木和雕刻金石，蚯蚓和螃蟹等六个事例，虽并非指某一匹马，某一次雕刻，某一条蚯蚓或某一只螃蟹，但毕竟是事实，一一概括的事实。

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为了说明“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就连用了两个典型的事实：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他为了说明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从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到王弼十几岁注《老子》，接连摆出了十五个典型事例。

摆事实，讲道理，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话虽通俗，却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讲清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讲话做工作应该这样，写文章也应该这样。

形象——文艺作品的事实

文艺作品也需要用事实说话吗？当然需要。文艺作品中的事实和新闻报道的事实不一样，它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说话的。它不必是真人真事（报告文学、回忆录、传记等除外），但它应该使读者相信，生活中是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的，是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是：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用有些人的说法，这是更高级的事实。

形象——文艺作品的事实。用事实说话，就是主要用形象说话，主要是用形象而不是用议论去感染人、教育人。刘心武同志的短篇小说，敢于和善于触及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是有个人风格的，也是为许多读者称道的。但他有的作品议论过多，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光明日报》曾发表过一篇《思考，但别忘了文学……——谈〈爱情的位置〉和〈醒来吧，弟弟〉》的文章。文章写道：“在这两篇小说中，几乎

到处是议论，人物都说着哲理性的警句。凡是作者在描写上、情节的进展上有困难时，就求助于议论。当形象本身还不能把作者想显示的含义告诉读者的时候，作者就运用议论。有时形象的描写具有了一定的鲜明性，也要迫不及待地加以说明。”文章又写道：“《爱情的位置》全篇的一万六千字，其中纯属议论的部分为三千三百字，是五分之一。其中第三节，整节一千五百字，几乎完全是关于爱情在革命者生活中的位置的议论。我试过，只要把几处稍加修改，就完全是一篇讨论爱情的说理文章。”我读过刘心武同志已经发表的大部分作品，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六二页）恩格斯在给玛·哈克奈斯的信中阐明的这种见解，值得每个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思考。

善于用以一当十的事实

文艺创作、通讯报道、理论文章，形式不同，用事实说话的要求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一定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的、生动具体的事实，抛弃一切片面的、枝节的、多余的、琐碎的、没有特征的事实。

在抗美援朝战争时，魏巍同志曾写过一篇《自豪吧，祖国》的通讯，里边用了二十多个事例，带回来给人看，感到不好，他就毫不惋惜地割爱了。后来他在写《谁是最可爱的人》时，只选择了三个典型事例：第一个反映对敌狠——松谷峰战斗；第二个表现对己和——战士马玉祥浓烟烈火中救小孩；第三个赞颂志愿军战士心灵美——“一把炒面一把

雪”的艰苦生活，充分表现了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这一时代主题。魏巍同志在谈写作体会时说：“事实告诉我：最能代表一般的典型例子，来说明本质的东西，给人的印象是清楚明白的，也会是突出的。”

用典型的事实揭示本质的东西，用得着这样两句话：掌握事实，要“韩信将兵，多多益善”；选用事实，要“孙子兵法，以一当十”。

不要把事实当儿戏

一家报纸登过一个基层单位领导干部的典型。文章为了说明他如何如何有威信，列举了他如何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事实。这些事实除有些分寸失当以外，都是真实的。但稿件见报后，却在这位领导干部所在单位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群众纷纷给报社写信，又举出了一些同样是真实的事实：在这位领导干部所领导的单位，近几年来铺张浪费严重，请客之风盛行，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六月，仅招待费就开支了四万四千四百八十三元！一九七七年，这位领导干部带领群众外出执行任务，五十多天时间就开支招待费四千三百八十多元！

这篇报道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写文章选择事实，不应满足于个别的具体的事例的真实性，而应该分析、掂量一番这些事实是否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文艺创作也一样，选材不能满足于是生活中有的东西，而应仔细琢磨、估量它究竟有多大普遍性、典型性。这里，重温列宁的一段话是很有必要的——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

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踏破铁鞋觅事实

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战士》这篇介绍共产党员、军医李维超同志事迹的通讯里，用了这样一个事例：

一个下肢瘫痪了五年、多方求治无效的工人张正苏，坐着车来找自己已重病在身的李维超给他治病。李维超详细询问了他得病的经过和治疗情况，然后答应下来。但是——

“李维超给张正苏做了几次针灸，疗效却不明显。一天夜里，他根据治疗情况和自己的实践，拿起四寸银针，在自己身上探索新的穴位，一点一点地摸索体会。突然，他感到右腿一阵麻木，落针处直发胀，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第二天，他按新的穴位落针，张正苏的右腿有了强烈的针感，能动弹了。张正苏摔掉拐杖，试着向前挪动了两步，高兴地说：‘小李，我现在就写决心书，要求参加工作！’

“当李维超第十二次去治疗时，张正苏已经爬上十来米高的电杆进行空中作业了。”

这个感人的事实是怎么得来的呢？据采写组的同志讲，

这件事在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但要在通讯里用它，还不够具体，于是决定找到张正苏本人，听听他的反映。不巧张正苏是在一个保密单位工作，治病时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李维超当时又在病中，忘记了地点。采写组找了几次都没找着。后来，他们知道张正苏的岳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但又不知道他岳父的名字。怎么办？采写组的同志不怕困难，找到了人民大学宿舍，连问一百多家，终于找到了张正苏，张正苏含着热泪向采写组讲述了治病的经过。结果，这个原来只准备简单一提的事例，成了通讯的一个主要情节。

真是踏破铁鞋觅事实！采写组的同志就是以这种精神，用近半年的时间，采访了八百多次，写出了数万字的素材，整理出三百多个故事，掌握了三十多个主要事例，比较成功地宣传了李维超这个先进典型。

这篇通讯的采写实践启示我们：事实客观存在，但决不会信手拈来。讲熟悉生活、掌握事实必须艰苦深入，用得着这样两句话：踏破铁鞋有觅处，得来全靠下功夫！

废话今昔

“言未尽，意无穷”，留有余地，让人回味，这是写文章的要求，“意已尽，言无穷”，罗里罗嗦，没完没了，这是写文章的大忌，整顿文风当中论及这个问题，有同志讲到秀才写信的故事，听着颇觉有趣，随手就把它记录了下来。

清朝有位姓钱的老秀才，做起文章来最不简洁，人称“罗嗦先生”。有一天“罗嗦先生”赴京赶考，到京后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吾妻如见：前日罗嗦而今日不复罗嗦矣！吾在下月即将返里，不在初一即在初二，不在初二即在初三，不在初三即在初四，……不在二十八即在二十九。所以不写三十，因月小之故也。家中有棉鞋一双，希吾妻取出拍拍打打；所以拍打，因灰尘多故也。希吾妻千千万万不可忘记。为省笔墨起见，吾不写草字头大万，即以方字去点代之……。”

哪个朝代不可考了，反正也是老秀才。有个不识字的人托老秀才给母亲写信，开头写了“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一大套，那个人说，我要给娘寄十两银子，你写上“银十两问娘好”不就得了？母亲的回信起先也是请老秀才写，也是先罗嗦一阵，这位母亲不满意，要秀才改成“银收母好”四个字。

这几位秀才，都有资格冠以“废话专家”的头衔。

爱说废话的人，中国有，外国也有。斯大林尖锐地批评